中国龙文化

徐贞同

中国是一个龙的国度。龙在中国人心目中、在中华民族、中国文化中呈现出特有的生命力，并且深入到中华文明的每一个细胞当中。龙对于我们华夏子孙来说，就是民族的遗传基因，是民族精神的寄托。海内外华人，只要是炎黄子孙，无不以龙的子孙而自豪，以龙的传人而骄傲。中国的龙是什么，龙文化有什么深刻内涵，我们不一定能回答好。所以，作为龙的子孙，我们必须清楚几个问题：为什么说我们是龙的传人？龙的传人为什么值得我们自豪？中国的龙文化有哪些丰富而深刻的内涵？对我们今天的生活有哪些影响？

龙，不是中国所独有，西方也有龙。由于民族历史、宗教信仰、风俗习惯、思维方式、生活方式，以及地域风貌等方面的差别，中西方文化对龙的理解呈现出极大的差异性。在西方文化中，龙是可怕的怪物，是罪恶的象征。这在古希腊神话传说和现代一些动画片中都有表现。而在中国文化中，龙的形象是积极的。 龙在汉语中大多具有褒义，如龙腾虎跃、龙飞凤舞、生龙活虎、龙吟虎啸、藏龙卧虎、龙马精神等。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内涵博大而又最富有魅力的形象。中国龙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龙的产生、形象及寓意是研究中国龙文化的基础。

一、龙的起源

在古生物学中，龙是指生活在距今两亿二千五百万年到七千万年以前的爬行动物。中国文化领域中的龙，并不是这种地球上普遍存在过的自然动物。闻一多说："龙是只存在于图腾中而不存在于生物界中的一种虚拟的生物。"它是一种中国文化中独有的人文动物。

龙的起源有多种说法：星象说、动物崇拜说、雷图腾说、胚胎说、河川说、闪电说、原始宗教巫术功能说、生殖崇拜说、图腾崇拜说和综合图腾说等。

龙的传说在史前就盛行，几乎与中华文化一样古老，仅仅用实物可资证明的这一崇拜在中国至少已有八千年的历史。上古时代，黄河流域的气温要比现在温暖，大部分植被保持着原始格局，甚至直到商朝的时候，中原地区还有大象生存。当然，毒蛇猛兽更是随处可见了。七八千年以前，人们制造石器，用集体的力量往往还可以捕杀猛兽，但是，对于既能生存于草莽丛林、又能生存于沼泽水滨的毒蛇却束手无策。毒蛇善于潜藏，不易察觉，发起攻击又有突然性，一旦被咬立即致命。生产力低下的原始人出于认识上的愚昧，畏之以为神明。《山海经》所记的古代各地神祇，形象与蛇有关的极多，由此可以推知，远古神州大地上信奉蛇图腾的氏族分布甚广。

我们的祖先在长期的实践中明白了崇蛇贻患的害处。他们对于蛇的活动规律也逐渐有了了解。他们发现雷的春震冬藏和蛇的春出冬蛰是一致的，他们经常从遇到的雷雨中看到金蛇狂舞，从偶然经历到的"龙卷风"中看到漏斗状的云好像巨蛇蜿蜒升天。他们为大自然的威力和雷雨交加的壮观景象所震慑。他们要以当时所能达到的最高知识水平来解释这种神秘莫测的现象，终于逐渐形

成了神蛇能够春天乘云升天变为雷神，秋冬回到地上潜藏蛰蛰的判断。龙——神话的蛇，我们祖先的一个伟大的、闪光的错误观念诞生了。龙从此区别于凡间的蛇，也代替了凡间的蛇，成了他们崇拜的对象。从蛇图腾崇拜到龙图腾崇拜，是原始人一个极大的进步。中华神龙从一开始腾飞，就是解放思想、破除陋习、开拓进取的象征。闻一多的说法描绘了中国龙的产生过程，但中国龙的形状不是在黄帝时期定型的，而是经历了一个长期演变的过程。

二、龙的文化意蕴

了解龙在各个不同历史时期表现出来的文化含义，有助于我们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更好地弘扬龙的文化，更好地继承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当好龙的传人。

（一）龙的初始意义。当我们说龙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时，指的是至少七八千年前，我们的祖先在渔猎经济形态下，用神龙的崇拜否定了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原始图腾崇拜，他们把对风雷云雨等自然现象规律性的认识，集中体现在神龙身上表现出来。龙的初始意义包括图腾和物候历法两个方面。“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潜渊”，在流传下来的龙崇拜的传说中，关于伏羲女娲人首蛇身交尾的图像所表达的故事，以及伏羲由雷神感生的神话等，都是遥远往古存在过龙图腾崇拜的遗迹的表现。

（二）龙从诞生起就有巫术崇拜的意义。龙是原始先民虚构的具有超自然性质的神物。他的这种属性，使他从诞生起，就有了巫术崇拜的意义。龙的巫术意义是从神话的蛇的初始意义来的。神蛇能够升空，因而古人幻想乘龙以行九野，乘龙而知四海，乘龙以上下于天。就这样，龙以其超自然的神力成为古代崇龙之族巫术活动

中的主角。

（三）走下神坛的龙。龙在巫术中的作用也有一个逐步弱化的过程。在商代，龙被作为一种形态怪异的神兽。周代的礼器上，龙的形象趋于弱化，龙的巫术意义转化为王权的象征，而且由于东周王室的衰微，龙的神性也进一步淡化。《荀子·王制》说："君子者，天地之参也。"人与天地并列，被称为"三才"。人已不再需要相信借乘龙以沟通天人。人对自身价值的认识和肯定，使人与龙的关系转化了。

（四）真龙天子的骗局。对龙文化进行历史的审视，其中固然有精华，但也有不少糟粕。早期的巫术崇拜对于凝聚氏族和部落的人心、统一部落成员的思想起过积极作用，晚期的巫术崇拜却成了国君兼巫教主利用天命来愚民的一种手段。刘邦制造龙感生的神话，坐上了皇帝的宝座。这一空前的成功，对后世觊觎帝位者影响至大。两千年来，觊觎帝位者袭用"真龙天子"的骗局愚弄百姓，直至辛亥革命后，袁世凯想做皇帝，也免不了制造这种骗局。

（五）龙与人中精英。龙，自秦汉以后就被统治者利用，成为皇帝和皇权的符号，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性。然而，龙的贵族化并没有取代它的平民性。龙，还是一代俊杰藏龙卧虎的美称，诸葛亮出山前自称卧龙就是一例；屈原吟《离骚》："虬龙鸾凤，以托君子。"龙是君子的别称；高才俊逸的风度奉为"龙章凤彩"；雄劲刚健的美文雅称为"龙文"；科举会试中选荣称登上"龙虎榜"；"望子成龙"更是天下父母的普遍心态。这说明"龙"又是对杰出的人和事的赞誉，所以龙在民间世俗生活中并没有成为帝王的专利。由此可见，龙是不凡的又是平凡的，从贵族到平民，从世俗到宗教，都欣赏龙、崇拜龙。龙的涵义具有多元性，龙已成为全民共赏的文化象征。

三、龙文化的历史意义和现代价值

（一）龙是中华民族“发祥和文化肇端的象征”

“发祥和文化肇端的象征”是闻一多先生在几十年前对龙的整体认识。现在，从几十年来考古工作的伟大成果来看，闻先生是非常富于远见的。现代考古学已将大量的龙文物清晰地展现在我们面前，通过对这些资料的分析，使我们看到了龙的源起与中华文明的进程是同步的，连绵不断的龙的发展轨迹，也可折射出中华文明史连绵不断的发展历程。

（二）龙是中国历史文化的信息载体

作为原始宗教思维一部分的龙的观念的形成，标志着原始社会组织结构的升华，有人说这是原始“礼”的萌发。进入阶级社会后，龙更是社会历史文化信息的主要载体之一。商代的龙是一种关系人类生活与命运的具有神性的动物。春秋战国时代的思想变革，在龙身上则表现为清新、奔放极富生命力的面貌。秦汉以降，由于封建主对龙的垄断，龙的地位日益提高，但龙作为全民共有的文化标志，其形象、精神仍然渗透到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不同时代的社会思想、民族意识、理想追求、科学文化等依然包含于龙文化中。自上古龙的观念形成后，其形象就是人们审美情趣的概括体现。之后，历代宫廷到民间的龙形象也无不体现了不同时代、不同层次人们的审美观念。

（三）龙文化体现了中国人神合一、天人合一传统文化的意蕴

龙是神灵，与巫术有密切的关系。巫师利用符咒，祈求上苍赐福，以求风调雨顺，百姓安康。而人神沟通、天地沟通，必须借助一种“物”，这种“物”就是“精气”。古人认为，精气是由云构成的，而云

气又充斥于天地之间，是天地沟通的媒介，龙则是从云衍生而来的。龙字是模仿云的形态，融流云飘柔飞升之势而创制的。龙，充分体现了中国人神合一、天人合一的传统文化的意蕴。

（四）龙文化体现了强烈的人文精神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龙文化，在中国的大文化体系中得到改造后，具备了强烈的人文精神。无论是作为祖先含义，还是作为自然神，能上天入地，无所不能，又由于具有驾驭大自然的能力，给自然界带来风调雨顺，被视为吉祥物，从而成为帝王权威的象征。总体上来说，龙文化的发展及其所具备的一切内涵，都是为了人的现实生活而服务。中国龙文化无论是在龙形象的形成上，还是在龙文化的祖先含义、自然神含义及皇权化象征上都带有浓厚的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龙文化中人文精神的传统属于过去，然而今天仍和我们同在，同时它又属于未来，我们要继承和发扬龙文化中的人文精神，使之为当今所用，使之走向中国的未来，走向中华民族的未来。

（五）中国龙从外形到内涵贯穿兼容与综合的精神

中国龙是一种人文动物，复合龙的创生，龙的起源和内涵的多元性等都体现出来了，兼容和综合是龙文化的主体精神，也是中国文化的原创精神。它的综合性和多元性在世界上独一无二，所以这东方巨龙又是世界第一龙。龙，就是多元相容的一大创造，龙的本身不仅兼容了多种飞禽走兽的形态和功能，连龙的后代也是多元相容的。这是中国人运用综合思维对多种生物兼容并蓄的成果，也是中国人早在史前时期就已初具的文化风格。中国人的文化兼容心理和综合思维方式创造了中国龙的独特形态。所以，兼容与综合

是龙文化的主体精神，也是中国文化的原创精神。兼容和综合是中华文化生生不息的优良传统，龙文化是中华文化形象化的表征，它不仅是华夏文明初创时期的特色，也贯穿于中华文化发展的过程，以兼容并蓄的胸怀吸收各地区和外来文化，建立多元复合的文化体系，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明。

中国文化对异国文化具有强大的涵摄力是举世无匹的，兼容精神正是文化吸纳能力的充分表现 。所以，从中国文化史上考察，任何文化进入中国则中国化，中华文化正是缘此不断纳新，生生不息。龙文化的兼容和综合精神，贯穿中国文化的发展，蔚为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使后世受惠无穷。

（本稿由泰州市社科联推荐）

徐贞同，1952年生，江苏泰州人，副教授。1982年于扬州师范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现任泰州职业技术学院经济管理学院教师，江苏省青少年写作研究会会员。多年来，主要从事中国传统文化、中国古代文学、基础写作等方面的教学与研究，先后在《扬州大学学报》等省级以上学术期刊发表学术论文近20篇，其中多篇论文获奖。

从历代咏巫支祁诗歌看古代的洪泽湖

陈斯金

洪泽湖自隋唐得名，巫支祁从唐宋开始流传。神话传说大禹锁淮涡水神巫支祁处，即今洪泽湖南岸龟山脚下。巫支祁与古代洪泽湖流域水患有着密切联系。隋唐以后，大运河的开通，洪泽湖地区的水上交通地位显得日益突出，巫支祁的传说也由此而产生，以至广泛流传。

巫支祁的故事产生于唐代，最早见于唐人李公佐拟古小说《古岳渎经》。与李公佐同时代人李肇在其《唐国史补》中也有简略记载。大体是说，巫支祁于淮水兴风作浪，祸害一方，后被大禹手下制服，用铁索锁于龟山脚下，之后淮水始安。文中还若有其事地交代，在唐代就有打渔人在淮水中发现过这种怪兽。北宋以后，巫支祁的故事广为流传，甚至还衍生了僧伽降服巫支祁(或水母)等新版本传说。仅在两宋就有《太平广记》、《太平寰宇记》、《路史》、《舆地纪胜》等著作详细记述。从文献记载来看，巫支祁的称呼有多种，除了另有“无支祁”、“无支奇”、“无支祈”、“无之祈”、“巫枝祇”等名字之外，还有“水神”、“水兽”、“水妖”、“水怪”、“神巫”等身份称呼，以及改名易性的“水母”、“圣母”、“水母娘娘”等异说。“巫支祁”不像汉文化中的人物名，据学者考证，其语音源头是梵文 Makara(摩羯)音译在吴、粤方言中的变异。至于其形象如猿，则有着中国神话传说

的古老渊源。

巫支祁故事的流传，也为南来北往于洪泽湖地区的文人骚客提供了诗歌创作题材。从历代咏巫支祁的诗歌意象中，我们可以窥见古代洪泽湖的历史面貌。

一、清淮浊汴："川锁支祁水尚浑"

在历代诗歌中第一次出现"支祁"意象的应该算是苏轼的《濠州七绝·涂山》诗了。濠州组诗写于宋熙宁四年（1071），这一年苏轼自京赴杭州通判任，舟行淮水，途中悠闲自得，幽思怀古。其《涂山》诗："川锁支祁水尚浑，地理汪罔骨应存。樵苏已入黄熊庙，乌鹊犹朝禹会村。"短短四句，几乎每句都用了典故。据《太平广记》引《古岳渎经》记载，为了制服巫支祁，"禹授之章律，不能制；授之乌木由，不能制；授之庚辰，能制"。可见巫支祁非常顽抗，在制服过程中大禹与之经过了激烈的搏斗。章律、乌木由和庚辰都是天神的名字，最后巫支祁被威武出色的庚辰所制服。所以苏轼说，"川锁支祁水尚浑"。全诗大意是：当年大禹搏斗擒拿巫支祁的淮水似乎依然浑浊，会盟诸侯因迟到而被斩杀的汪罔氏之君的骨头应该还在吧。如今鲧王庙已经废弃了，只有涂山脚下的禹会村还不断有人前往朝拜。苏轼的诗高度赞扬了大禹理洪水分九州的不朽功绩。因为大禹擒拿了巫支祁，苏轼笔下的淮水相对来说算是安宁的。

清代《重修安徽通志·舆地志·下龟山》引"清淮浊汴争疆健，龟山下瞰支祁宫"，误为苏轼诗句，其实是苏辙所作。苏轼赴杭州通判任，途径泗州留下《泗州僧伽塔》诗，苏辙随后《和子瞻泗州僧伽塔》一首。诗为七言古诗，共二十句。开头两句即"清淮浊汴争强雄，龟

山下閟支祁宫”。僧伽塔在泗州城内，位于淮、汴交汇处。距离僧伽塔东北三十里的龟山脚下就关押着被大禹制服的巫支祁。在南宋朱熹《楚辞辩证》、罗泌《路史》以及王象之的《舆地纪胜》等书中都出现过僧伽降巫支祁（或水母）新传说版本的记载。也许巫支祁与僧伽的关系在苏辙时代就已经流传了。苏辙在幽思怀古之际，更多地描绘了现实中的情景：“高秋水来无远近，荡灭洲渚乘城墉。”诗中一方面极写水势的险恶，另一方面又描绘僧伽的灵异：“蛟龙百怪不敢近，回风倒浪归无踪。”所以巫支祁尽管能兴风作浪，但因为有僧伽的护佑就不足挂齿了：“区区淮汴亦何有？一挹可注沧溟东。”不过，苏辙还是有点纠结：“胡为尚与水族较，时出变怪惊愚聋。”大概诗人寄情于景，既有力挽狂澜的雄心壮志，又意识到了现实的险恶。

作为苏门四学士之一的张耒，是楚州淮阴人，他写过一首五古《龟山水陆院》。“院静步柏影，庭虚闻塔铃”，庭院里非常寂静，宛如世外桃源，古柏成荫，塔铃清响。“山背负华殿，淮身朝广庭”，寺院的环境非常优雅，依山傍水，视野开阔。“支祁万古穴，石老深潭清。坐令金仙力，镇此水府灵”，传说中的水怪巫支祁就被制服在古穴深潭下面，眼前的寺院就是为了镇压淮水灵兽而建立的。据记载，龟山水陆院为宋真宗时修建，筹建者为金臂禅师，后人奉为圣者。“寺临淮水，负小山，规制壮丽。自京师以南寺观，皆不及也。”寺中建有白塔，张顺民有诗：“白塔摇摇波浪间，几多舟楫望禅关。”张耒诗中的“支祁”意象一方面给龟山禅院加深了神秘性，同时也增添了镇妖安淮的现实功利性。

关于淮涡水神一直有两个版本：一是官方版本，大禹擒获巫支

祁;二是佛教版本,僧伽制服水母。不仅如此,民间还把水母当水神、圣母供奉。龟山上有座始建于唐代的淮渎庙,传说供奉大禹时治水力士庚辰,后又演变为淮河水神、水母娘娘。所以,明初学者郑真有诗《龟山水母庙》:"青山如伏龟,巨石压清浪。岗峦相起伏,隐隐城郭状。忆淮南渡余,金戈严保障。封疆南北分,放歌一凄怆。铁锁锢支祁,禹功千载上。吁嗟水母称,谁能辨诬谤。"龟山因其形如龟而得名,又因其地理位置重要,所以在古代一直成为淮滨重镇。龟山上,南朝宋文帝曾遣将拒魏太武帝,筑城于此。至明代尚有遗址可寻。从文字记载来看,巫支祁为大禹命庚辰所获并锁于龟山脚下,但民间又广泛流传着水母(即水母娘娘)的故事,真是一件令人费解的事情。其实,这种现象一方面反映出神话传说的变异性,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民间与官府的对立,既然官府无力治好水患,那么老百姓就只好寄希望于水神保佑了。

二、水患灾民:"多半支祁锁未坚"

南宋以前,洪泽湖地区的水患还不算很大,相对比较安宁。所以苏轼、张耒等人才有闲情逸致幽思怀古,苏辙的笔下才会有"区区淮汴亦何有?一挹可注沧溟东"的豪情。到了宋高宗建炎二年(1128年),为了阻止金兵南下,东京留守杜充于河南李固渡西决黄河,遂造成了历史上第一次黄河南流夺泗入淮。自此以后,人为的,自然的,黄河屡次改道南下夺淮入海。直至明孝宗弘治八年(1495年),刘大夏堵黄陵岗等处决口,筑成太行堤,淮河自此全流入淮,会于淮阴,奔腾浩淼,东溃西决,给洪泽湖地区造成的灾难可谓惊天地泣鬼神。

元代陈孚有诗《黄河谣》:"长淮丝如苔,飞下桐柏山。黄河忽西

来，乱泻长淮间。冯夷鼓狂浪，峥嵘雪崖堕。惊起巫支祁，腥涎沃铁锁。两雄斗不死，大声吼乾坤。震撼山岳骨，磨荡日月魂。黄河无停时，淮流亦不息。东风吹海波，万里涌秋色。秋色不可扫，青烟映芦花。白鸟亦四五，长鸣下汀沙。渔翁一鬓霜，扁舟依古树。隔浦欲叩之，翩然凌波去。”元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大一统王朝，作为大汉族的陈孚还是满怀热忱欢迎这个北方统治者的。“自知报国无他技，赖有诗书可策勋”，陈孚因献《大一统赋》而步入仕途。所以，我们看陈孚的《黄河谣》，尽管把淮、黄“两雄斗不死”的气势写得惊心动魄，但似乎还看不到灾民悲惨的情景。诗的结尾反倒通过秋色里白鸟的“长鸣”、白翁的“翩然”给人一种惊魂之后的恬然。不过“惊起巫支祁，腥涎沃铁锁”的神笔勾勒已经让我们想象出洪水泛滥、覆巢之下焉有完卵的凄惨景象。顾嗣立在《寒厅诗话》中把陈孚归属于“奇才天授，开阖变怪，骇人视听，莫可测度者”的创作风格，也许《黄河谣》留给我们的是更多的揣测想象空间。

如果说陈孚的诗主要描绘的是水势，那么清代许凌云《泗水患》就非一个“患”字所能了得。“多半支祁锁未坚，茫茫浩浩又滔天。大风陡起三篙浪，小屋如浮一叶船。夹岸芦汀花是壁，依沙舫子水为田。劝君莫把清贫厌，菱角鸡头也度年。”诗的一开头就通过“支祁”意象把遥远的洪水传说拉到了眼前的“又滔天”现实。接着描写凄惨景象，狂风骤起，浊浪排空，满目汪洋，房毁屋漂。高高长在岸边的芦苇如今只能看到芦梢，一个“花”字便衬托出洪水的残暴。以往的农田已经没于水底，颗粒无收，老百姓何以为生？在过年的时候能吃上菱角鸡头（俗称鸡头，是江淮一带生长的一种水生植物，因果实形状像鸡头而得名，果实可食）就不错了，这种情景已经

无法用穷困潦倒来形容。可以想见，水患给洪泽湖流域造成灾民淹死、饿死难以计数。许凌云是泗州人，对此必然是深有感受，触目惊心。据史料记载，仅在万历年间，万历元年、三年、五年、七年、十九年、二十一年、二十三年，洪泽湖流域就分别发生过巨大的洪涝灾害，几乎是每隔两年发生一次。每次灾害都给当地居民造成家毁人逃，溺死、饿死、病死者无数。

三、治水安民："井冷支祁力半销"

洪泽湖是一个半人工湖，也是悬湖。最早始自东汉建安五年，广陵太守陈登于淮河中下游结合处，筑土堰以御淮河决溢之水。自隋唐以后，为了保护下游的大运河漕运畅通，特别是在黄河夺泗入淮的水患下，历代治河者逐渐加高加固了原有的大堤，洪泽湖的水域随之扩大，以致于康熙十九年（1680 年）淹没了一度繁华的泗州古城。在泗州城还没有没入水底之前，泗州城与盱眙县城隔淮相对，淮河上有浮桥相连。清代戚玾写过一首《浮桥新成》："星槎难问斗牛遥，天堑俄分第一桥。彩鹢横飞淮北雨，苍龙怒啮海东潮。山开神禹功徒费，井冷支祁力半销。行旅只今歌利涉，不须欸乃叩兰桡。"戚玾（1635–1688），泗州招贤里（今属江苏盱眙）人，工诗，好为新语，有《笑门诗集》。《浮桥新成》一诗，写得气势恢弘，高度赞扬了浮桥的利民之功。当然，气势恢宏的诗句也正预示着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浮桥命运，"山开神禹功徒费，井冷支祁力半销"，势不可挡的黄河倒灌，使得洪泽湖水终于在诗人 46 岁这一年吞噬了浮桥，也吞噬了泗州古城。

有清一代，洪泽湖地区的水患较之前代为甚。这并非清朝统治者治水不力，而是积重难返。明代潘季驯提出束水攻沙方案的

实施，虽然在当时也起到了一定效果，但黄强淮弱，黄河的泥沙最终还是越淤越多，河流不畅，从而导致湖涨堤决、洪水肆虐。道光年间，陶澍是一个勤政爱民有所作为的官员。道光十年（1830年）陶澍由江苏巡抚擢升为两江总督，这一年他写下了《庚寅九月二十日自武家墩晨发勘视堰盱堤工周历洪泽湖往返三日慨然有作》一诗。“往来三日间，长堤行纡徐。太息此湖水，混茫涵太虚。作堰始陈登，于传或有诸。历代相祖述，畚筑盛规模。既使北刷黄，更南通漕储。虹堤亘一线，淮乃化为渠。太息古淮水，一渎归尾闾。奈何截其流，南北不得舒？沉浸没日月，崖岸成渚圩。僧伽塔已倒，支祁锁已淤。胶龙与虾鳖，溷杂同一潴。遏阻思铤险，郁极气必嘘。常恐喷薄余，浩浩民为鱼。性命托老兵，奔走疲吏胥。金钱岁百万，抛掷沙泥如。事体洵重大，跋疐多孪拘。太息天地间，得失相乘除。七窍凿混沌，成毁在须臾。盗笑圣人死，智欺河叟愚。谁能纵天戕，相与还其初。凉飚堤上来，飒爽吹衣裾。却望老子山，中有神人居。”诗中主要述说了自汉代陈登以来，历代加筑洪泽湖大堤的功过是非。“僧伽塔已倒，支祁锁已淤。”如今僧伽塔已经随泗州城的沉没而倒掉了，巫支祁的铁锁链也随泥沙的积淀越淤越深。但是，历代治水的官吏依然疲于奔命，挥金如土。也许是有所得必有所失吧，但愿老子山上的神灵保佑这一方水土的安宁。陶澍已经意识到高筑洪泽湖大堤护漕保运的艰险，所以在任期间，他积极开拓海上漕运的新航线。

清代另一位治河大臣麟庆，曾较长时间担任江南河道总督。他在《龟山问井》一诗里这样写道：“天藻辉煌下紫宸，小臣亲捧拜新恩。元圭早仰当年绩，白璧期盟此水神。罗汉梁空忘甲子，支祁井冷

重庚辰。临流又动庄严愿，土蚀波湮丈六身。”麟庆对朝廷的任命小心翼翼，同时也雄心勃勃，希望能一展抱负。龟山上有支祁井，又称水母井或圣母井，位于龟山西南隅绝壁下。龟山寺有佛殿三座，其中无梁殿最为著名。张商英《龟山水陆院记》云：“以佛书考之，则五百梵僧游止之地。”所以寺有五百铁罗汉。明清之际，寺逐渐圮毁。道光十七年（1837 年），麟庆过龟山发现此遗址，乃重修，并易名安淮寺。

麟庆任职期间，淮水一度安澜，但他也深知“然亦幸连年未遇异涨，实邀神佑”。洪泽湖大堤处于黄、淮、运相交地带，在当时的经济和技术条件下已经形成了难以克服的治理死结。尽管麟庆励精图治，但已势成强弩之末。道光二十二年（1842 年），麟庆终因河患突发而被革职。他在离任回京时带着遗憾为清江浦（袁浦）老百姓留下了这样的诗句：“十载袁江久宦游，惭无政术奠黄流。北行实对斯民愧，南顾难纾圣祖忧。”

咸丰五年（1855 年），黄河决铜瓦厢，长达 700 年之久的南流入海，自此北徙入渤海，但洪泽湖地区的水患并没有随之消停。黄河长期夺淮带来的巨量泥沙完全改变了淮河入海的原有水道，期间洪泽湖大堤依然多次溃决，洪水左冲右突寻找出路。直到解放后，淮河、洪泽湖才得到了彻底治理。在安享洪泽湖湖光水色的今天，翻开历代咏巫支祁的诗篇，我们惊奇地发现，自唐宋以来，骚客、政客们，每当莅临淮滨湖畔，或幽思怀古，或同情灾民，或炫耀政绩，都很自然地想到巫支祁。诚然，巫支祁并不是什么超自然的神物、怪物，巫支祁不过是人为杜撰的神话、传说，历代文人政客以及黎民百姓也都是各取所需。也许一代能臣陶澍看得最为淡

然:“水底支祁冷笑人,此过非吾定谁责?行行我是问津来,隙听木鱼正呼客。”

(本稿由宿迁市社科联推荐)

陈斯金,江苏宿迁人,宿迁学院中文系副教授。西楚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宿迁市民间文艺家协会理事,宿迁市社科系列文学学科带头人。长期从事文学理论课程教学,发表文艺学、地域文化等方面的论文数十篇,参与编写多部著作,有多篇论文在省、市政府以及社会团体组织的学术成果评比中获奖。近年来主持了“洪泽湖历代诗文研究”、“洪泽湖文学研究”等省、市级课题。

《全唐诗》是怎样花落淮盐的

吴方友

300多年前，一项巨大的文化工程在淮盐完成

历史不会附属风雅，但历史却会催生风雅。

《全唐诗》就是由历史巨擘之手催生的，一部尽显唐诗风雅的诗集总汇，人称“唐之韵”。

诗家说，唐之后无诗，宋之后无词。这是说唐诗代表中国古代诗歌的最高成就，而宋词则是代表中国古代词章的最高成就。这是两座彪炳中国历史而不朽的文化丰碑，并使后来者一直无从超越。

当代知名学者胡晓明论及唐诗，说唐诗是以“山水为教堂，以文字为智珠”。唐人以尽心尽情尽才尽气的精神，深得诗心，于是有了许多的诗。但是，古代没有条件都刊刻出来，“唐诗这坛酒太深了，只能取一瓢饮”，于是就出选本，以品尝唐诗的美妙。选本中人们一向以汇集了唐诗精粹的《唐诗三百首》作为样本，而加以推崇，事实上这个唐诗选本，自问世以来，的确流传很广。在国学大师开列的唐诗荐本中，除《唐诗三百首》外，《全唐诗》常赫然在目。胡适先生1923年在清华时，应学生之请，开有一个《实在的最低限度的书目》，其中收录图书约190种，令人瞩目的是曹寅、彭定求著的《全唐诗》。又如梁启超、胡适、汪辟疆、蔡尚思和屈万里五位国学大